

破竈燒滷華那

知是寒衣但見鳥

銜因君門深

九重凌美土在万里也擬

哭塗窮死屋吹不

苏轼选集



苏 轼 选 集

刘 乃 昌 选 注

齐 鲁 书 社

一 九 八 〇 年 · 济 南 ·

苏轼选集

刘乃昌 选注

齐鲁书社 出版发行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0.25印张 2插页 152千字

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000

书号 10208·8 定价 0.90 元

略论苏轼及其文学成就

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
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

清代诗人赵翼的这两句诗，从强调文学必须发展、创新的观点出发，提出了各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领袖的见解，这是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实际情况的。苏轼就是北宋文坛上领袖一代的重要作家。他毕生致力于创作，在诗、词、文各方面都有独诣的成就，对宋代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征途中，彻底清算“四人帮”极左路线对文化工作的破坏，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则，实事求是地研究苏轼的宝贵遗产，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需要。

—

文艺是群众的事业，一个作家的作品，只要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魅力，就会赢得社会的赞赏，得到广泛的流传。因而作品的社会效果，是检验作家文学成就的重

要标尺。

苏轼的作品在宋代社会的传播是十分广泛的，这种情况在当时还没有其他作家能够与之相比。苏轼在入京应举时，就因文章得到当时文坛老宿欧阳修的奖誉而崭露头角。随后宦游各地，“文字传于人者甚众”，每一落笔，“流俗翕然争相传诵。①”在徐州登燕子楼作《永遇乐》词，脱稿不久，即“哄传于城中②”。黄州歌手李宜因未能得到苏轼赠诗，长期抱憾，苏轼得知后写诗致歉说：“东坡居士文名久，何事无言及李宜？③”后来苏轼的岭南诗盛传一时，“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，自觉气索④”。苏轼的文章更成为北宋中叶以来应第举子的必读课，因而在生员中流传着“苏文熟，吃羊肉；苏文生，吃菜羹”的谣谚⑤。

苏轼的作品不但流布中原，也为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人所熟悉，甚至远传国外。当时出使宋朝的辽国使者能熟练地背诵苏文。辽朝馆伴人员在接待宋使时，也曾把苏轼诗文作为谈资，指出东坡喜用佛典⑥。宣和年间，朝鲜有人自名为轼，以表示对这位中国作家的向慕。元祐四年苏辙出使契丹时，不少契丹人向他打听苏轼的情况。苏辙在《神水馆寄子瞻兄》诗中说：“莫将文章动蛮貊，恐妨谈笑卧江湖⑦”，可见苏轼文章轰动边廷的说法并非夸大之辞。

随着印刷业的发展，特别是熙宁年间朝廷取缔不准

擅刻图书的禁令之后，苏轼诗文的刻印本层出不穷，不胫而走。元丰二年何大正等弹劾苏轼时，曾搜集苏轼流传各地的文字，“独取镂板而鬻于市者”，就所得甚多^⑧。苏轼自己也说：“世之蓄轼文者多矣”，“市人逐利，好刻某拙文”，“贾人好利，每取拙文刊刻市卖”。^⑨当时的边远地区也有苏轼作品的刻本，如范阳书肆就曾刊印《大苏集》。书商借刊印苏集来营利，说明苏轼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。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说：“轼诗文衣被天下，刻本丛杂，较欧阳修集更夥，诸家所纪，不可殫数”。可见苏集刊本之多。

由于苏轼的作品所至风靡，因此搜集、编纂和注释其作品的，在苏轼当时和整个宋代不乏其人。大约最早研究苏轼作品的是彭城人陈师仲。他于元丰中期曾搜集苏轼在密州、徐州两地做太守时所写的诗篇，编成《超然》《黄楼》二集，征询苏轼的意见。苏轼晚年从岭外归来之后，有个叫刘沔的又曾“掇拾编缀，略无遗者^⑩”，纂录了苏轼诗文二十卷，寄呈作者过目。除了苏轼的及门弟子黄山谷、陈无己等早对苏诗有所撰述外，对苏诗进行编年注释的，在苏轼晚年有赵次公、宋援、李德载、程演四家，其后又扩展到五家注、八家注、十家注。王十朋在绍兴年间曾搜集约近一百人解释苏诗的撰述，对苏诗进行分类集注，陆游同范成大曾经讨论过东坡诗的解释问题，范成大希望陆游“作一书，发明东坡之意^⑪”，

可惜这个建议未能实现。关于苏轼散文，吕东莱编过一个选本。郎晔曾拣选四百多篇，为之作注，于光宗绍熙二年上表奏进朝廷，称为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。苏词在绍兴年间也有注本流行。搜集研究苏轼作品的在当朝就如此之多，这也是宋代其他作家所不能比拟的。

苏轼的文字在北宋末年遭到禁毁的。蔡京打着“绍述”熙宁的旗号，大搞派别倾轧，先将司马光、文彦博等一百二十人，后又扩大到三百零九人，列为“元祐奸党”，由徽宗两次亲笔书写，刻石朝堂，颁告全国。苏轼因被置入党籍，所作诗文就成了禁品。崇宁二年，朝廷还下令将苏洵、苏轼等人文集雕版“悉行焚毁”。但是朝廷禁令是没有用的，苏集照样在人们中传播，甚至有把它“藏于衣褐，间道出京，为逻卒所获者^②”。即此可见，文艺作品的吸引力量，无法用强制手段来加以消除。这一切充分证明苏轼的文学成就是“横据一代”、影响深远的。

二

苏轼生活于十一世纪后半期的北宋社会，这是封建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时代，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时代。

经过赵宋建国后近百年来，社会相对稳定，到北宋

中期，农业、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，手工业提供了许多发明、创造。在广大人民辛勤劳动所创造的丰厚物质基础上，北宋的文化生活出现了普遍的高涨，文化教育、印刷出版、音乐美术等等，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。例如当时除了京都有国学之外，各地又普遍建立了郡学县学，“学校之设遍天下^⑬”；宋代科举取士，不问门阀，但看文章，比之唐代更为开放；随着刻书业的繁荣，文化典籍广泛传播，官署私家藏书很多，“学者之于书，多且易致^⑭”；音乐绘画也有很大发展，隋唐以来兴起的“今曲子”，至宋“繁声淫奏，殆不可数^⑮”；绘画题材扩大，名家辈出，朝廷设立的规模庞大的“翰林图画院”，罗致了不少全国闻名的画家会聚汴京。在文学领域，经过长期的酝酿准备，欧阳修、梅尧臣、苏舜钦所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，已经汇为巨流，蔚然成风，这也为苏轼把诗文革新运动继续推向高潮，准备了必要的条件。苏轼杰出的文学成就，正是北宋社会文化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。

在经济文化向前发展的同时，北宋的种种社会矛盾也日渐增长。宋真宗、仁宗“不抑兼并”的国策，助长了大地主、大商人势力的膨胀，形成了发展生产力的桎梏；官僚机构的臃肿、冗兵滥官的激增和皇室贵族的侈糜，大量地消蚀了社会财富；西北边境辽、夏的进逼和朝廷的纳币妥协政策，加剧了国防和财政危机；统治

阶级把庞大的经济负担强加在广大人民头上，用各种名目和手段横加盘剥，使社会生产走向凋弊，人民生活苦不堪言。在这种政治趋于腐朽、经济近于崩溃、社会问题逐渐严重化的形势下，一些头脑清醒的士大夫为替赵宋政权寻求一条自救的出路，曾先后提出或推行深度不同的改革主张和方案，而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变法运动，更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掀起了轩然大波，引起了长期而激烈的论争。

苏轼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，走入仕途登上文坛的。

苏轼生于寒素的地主家庭。在著名散文家其父苏洵的熏陶影响下，经过勤奋地学习，二十几岁的苏轼已能博通经史，驰骋文墨，因而在入京应举时，一开始就获得了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。

年轻气锐的苏轼，针对当时财乏、兵弱、官冗和赋役不均、边备空虚等问题，曾写了《进策》二十五篇、《思治论》等论文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，希望天子改变因循萎靡的局面，“涤荡振刷，而卓然有所立。”^{①6}

当熙宁初年，苏轼为父亲办完丧事重回汴京之时，改革家王安石正在神宗支持下雷厉风行地实行变法。苏轼虽然也主张改革，但对于超出了自己眼界的王安石那种更大胆的改易更革，却表示异议，连续上书反对，并因此要求调离京师。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，苏轼历任

杭、密、徐、湖各州地方官。其时河北京东天灾连年，他每到一地，都较注意了解民间疾苦，关切生产抗灾。在徐州因同百姓一道抗洪，乃至“庐于城上，过家不入”，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苏轼对变法持有不同意见，时常在诗文中“托事以讽”，这却引起了变法派官僚的忌恨，他们罗织罪名，深文周纳，把苏轼投入监狱，经过严重折磨，苏轼被贬谪黄州。“我谪黄冈四五年，孤舟出没烟波里，故人不复通问讯，疾病饥寒疑死矣！^⑭”就是他当时潦倒处境的真实写照。苏轼在黄州虽然一方面郁愤满肠，一方面仍然关怀国事，正视现实，写下了不少作品。

元祐时期，高太后听政，旧派上台，王安石病死，司马光要废尽新法。这时被调回京师任翰林侍读的苏轼，在长期的变法实绩面前，认为部分新法行之有效，“不可尽改”。因此又遭到旧党的排挤，不容于朝，先后被派知杭州、颍州。

在高太后当权时，旧派依附后党，不以年轻的哲宗为意，高太后死后，哲宗厌弃后党，一些官僚乘机打起“绍述”新法的旗号倾陷异己，苏轼又被当作打击的对象，一贬再贬，由英州、惠州一直远贬到荒远的琼州。在这时期，苏轼襟怀坦荡，傲视忧患，吟诗著文，“精深华妙，不见老人衰惫之气。”^⑮

苏轼一生得罪都由于口祸。熙宁初年友人与可鉴于

他“口快笔锐”，在送他通判杭州时，曾提醒他：

“北客若来休问事，西湖虽好莫吟诗！”^⑭

毕仲游后来也写信劝他说：

“官非谏官，职非御史，而非是人所未是，
危身触讳以游其间，殆犹抱石而救溺也^⑮。”

可是苏轼讥议朝政的作风始终未改。原因何在呢？

苏轼少年就“奋厉有当世志”，“少小不为身，宿志固有在”。^⑯苏轼十分赞扬杜甫“流落饥寒，终身不用，而一饭未尝忘君^⑰”的精神，也曾在诗词中对“胸中万卷，致君尧舜”、“雨顺风调”、“民不饥寒”表示祈慕。这说明苏轼具有儒家那种辅君治国、经济济民的理想。尽管这种理想归根结底是从维护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的，但在北宋后期赋役不均、征敛无度、官如豺虎、民贫到骨的现实情况下，仍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。

赵宋统治者提倡儒、道、佛兼蓄，强调三教“迹异而道同”，当时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深受影响。不过三教融合的趋势，体现在各人身上又各具特点。苏轼是博采三家而圆通灵活地加以运用的。他奉儒但不十分迂执，谈禅并不佞佛，好道没有流入厌弃人生。他善于摄取所需而致其用。大体上是以儒家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入世精神来从政，以老庄的乘时归化、反朴任天的态度来养身，把禅宗的看穿忧患和儒学“无入而不自得”的思想结合起来，对付人世的坎坷与磨难的。苏轼一生政

治上虽不得意，但未离开仕途。因此，苏轼的儒家政治理想在他的政治和文学生涯中始终起着重要作用。

正由于此，苏轼在政治上的一生没有忘怀现实，对地方，常常能征询疾苦，因法便民；对朝廷，则每每直言敢议，指陈得失，提出自己的政见。在文学上，则主张“诗文皆有为而作，精悍确苦，言必中当世之过”^{②③}。即使在政治上遭受挫折、牢骚满腹时，也没有使他正视现实的热情冷却起来。苏轼曾说：

“窃怀忧国爱民之意，自为小官，即好僭议朝政，屡以此获罪，然受命于天，不能尽改。”

“轼平生以语言文字见知于世，亦以此取疾于人……以此常欲焚弃笔砚，为喑默人，而习气宿业未能尽去。”^{②④}

苏轼这种态度自然不是什么“天性”，而是现实环境的产物。北宋统治者采取优渥士大夫的政策，很少杀戮大臣，但为了分割牵制大臣的权力，以强化皇帝的集权，又有意提倡谏官讥议时政，监督、弹劾朝臣。士大夫中也留意砥砺谏官风节，官员敢于直言极谏，即使受到朝廷处分，威望仍有增无减。苏轼正是以此自相期许。他曾在奏章中说：

“臣闻圣人之治天下也，宽猛相资，君臣之间，可否相济。若上之所可，不问其是非，下亦可之；上之所否，不问其曲直，下亦否之；则是晏子所谓以

水济水，谁能食之？孔子所谓惟予言而莫予违，足以丧邦者也。……臣之区区，不自量度，常欲希慕古贤，可否相济。”^{②5}

苏轼有改革政治的理想，敢于发表不同意见，反对唯唯诺诺的作风，在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中，也取这种态度。他在《与杨元素》信中说：

“昔之君子，惟荆是师；今之君子，惟温是随；所随不同，其为随一也。老弟与温相知至深，始终无间，然多不随耳！致此烦言，盖始于此。然进退得丧齐之久矣，皆不足道！”

这倾心之论，说明在司马光上台，人们千口一调地废弃新法时，苏轼不愿一切顺风附和，即使遭致人们的责难也在所不顾。自然，“在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者”（《列宁全集》第十卷五九页）。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，也不能超然。因此，必然有所随，有所不随，随乎此，必离乎彼，关键在于所随的主张是否正确。不过，苏轼所谓“随”，显然是指顺风使舵、投机干进，这却是要不得的。一个阶级、一个集团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，也会有不同意见，也需要听不同的声音，因此古代有人提倡“兼听”。苏轼从巩固封建政权出发，主张议政要“可否相济”，而反对一切顺风附随，这是很有识见的。

不过，封建主义与开放言论是不相容的。特别在倾

陷成风、党争剧烈的北宋后期，苏轼的直言敢议、耿介不随，必然使他在政治上遭受很大的磨难。然而，在旧时代一个作家政治生活上的失败，常常会使他在文学上得到意外的成功。正是由于苏轼不断遭受来自统治集团的打击、排斥，一生仕途崎岖，他才有机缘转徙四方州郡，历览名山大川，饱经政治升沉，结识各种人物，了解官场弊害，体察风土人情，目睹民生疾苦，接触下层生活。从而加深了阅历，扩大了视野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生活基础。“秀句出寒饿，身穷诗乃亨”。苏轼的两句诗，可以说是他一生创作道路的自我总结。

三

古、律诗经过辉煌发展的唐代，至五代、宋初而落入低潮，梅尧臣、苏舜钦、欧阳修开始变革西昆的萎靡积习，使宋诗打开了自己的道路，但都“未诣其盛，至坡公始以其才涵盖古今”，卓然成为一代诗宗。

苏轼一生写了二千七百多首诗，广泛地描写了十一世纪后期中国的社会生活，在读者面前展开了琳琅满目的艺术画卷。

“民病何时休”，“悲歌为黎元”。苏轼怀着“为黎元”的愿望，写了不少同情人民的诗篇。认为写景抒怀才是苏诗的长处，是不够全面的。苏轼在早年的日常

生活中，已经直觉地感到了社会上的贫富悬绝、苦乐不均。后来诗人长期转徙州郡、四方奔走，目击农村凋弊、百姓困苦，不禁为北方和江南人民的悲惨遭遇，唱出同情的悲歌：

“三年东方旱，逃户连敲栋。
老农释耒叹，泪入饥肠痛。
——《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》

“哀哉吴越人，久为江湖吞。
官自倒帑廩，饱不及黎元。”
——《送黄师是赴两浙宪》

苏轼不仅在诗中留下农民痛苦生活的真切剪影，而且还进一步揭示出官府的苛征重敛，地主的无穷盘剥，是造成人民苦难深重的重要原因。在《渔蛮子》诗中，苏轼写了一家老少为逃避租赋终年蜷伏在破船上到处漂流的情景。“人间行路难，踏地出租赋！”这画龙点睛之笔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地租剥削的无孔不入。苏轼怀着关切民瘼的心情，主张朝廷要“节用以廉取”，反对统治者“富而愈贪^②”，对他们不顾百姓死活、一味盘剥人民的罪行，给予了尖锐的批判。他讽刺晚唐五代时的李茂贞“抽钱算闲口，但未榷羹粥”，指责当朝官僚“争新买宠各出意，今年斗品充官茶”，显然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。苏轼同情人民，还表现为他对社会生产的重视和对民生问题的关切。因此，抗灾恤贫、兴办水利、改善劳动工

具和生活条件，也成为苏诗歌咏的重要题材。例如《次韵章传道喜雨》记录了作者在密州组织百姓抗蝗救灾的事实；《答吕梁仲屯田》反映了作者在徐州同当地百姓一道抗洪的情景；《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》对太守霍翔提出了利用当地水源为密州兴办水利的期望；《秧马歌》以轻快的笔调，描绘了农民骑秧马插秧的生动场景，反映了劳动人民从事生产斗争的高度智慧；《游博罗香积寺》用丰富的联想反映水力碓磨建立后，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许多方便，体现出诗人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的美好憧憬。苏轼在密州任满离去时，曾因当地生产低微而深感内疚，便写了《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》诗，把十万贫羸的百姓殷切地嘱托给新来的郡守：

“秋禾不满眼，宿麦种亦稀。
永愧此邦人，芒刺在肌肤。
平生五千卷，一字不救饥。
…………… 何以累君子？
十万贫与羸！”

这语重心长的诗句，表明诗人关怀生产、同情人民的感情是真切的。

“西羌解仇隙，猛士忧塞墙！”表达“忧塞墙”的爱国热忱，也是苏诗的重要内容。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力较弱的的一个王朝，自宋太宗征辽失利起，部分官僚就鼓吹“守内虚外”，而澶渊之盟以来，宋廷更对辽、夏的

进逼一味妥协退让，加深了边防危机。苏轼觉察到民族矛盾的严重，力主居安虑危、整军备敌，苏诗的不少篇什，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出这种昂扬的爱国精神。诗人热情地歌颂勇于赴敌的爱国将士。如《阳关曲》描写了一个跃马挥戈的紫髯将军，对他未能斩取敌酋深表惋惜；《郭纶》歌咏了一个在防卫边廷中屡立战功的少数民族弓箭手，赞扬了他“愿作万骑先”的勇武气概；在《将官雷胜得过字代作》诗中，刻画了一个出入敌阵、捍卫边廷的常胜将军：

“胡骑入云中，急烽连夜过。

短刀穿虏阵，溅血貂裘洌。”

在现实的民族矛盾触动下，苏轼立功报国的雄心，也时时形之歌咏。治平元年秋天，西夏多次骚扰宋境，杀掠人畜，朝廷曾于陕西点差义军，守卫边廷。苏轼这时在《和子由苦寒见寄》诗中说：

“庙谟虽不战，虏意久欺天。

山西良家子，锦缘貂裘鲜。

千金买战马，百宝妆刀镡。

何时逐汝去？与虏试周旋！”

抗敌报国的热忱溢于言表！元祐二年夏人不断侵扰洮州、三川等地，刘昌祚、种谊曾奉命抵御，苏轼也在《和王晋卿》中提出了“何当请长缨，一战河湟复”的殷殷期望。苏轼还时常以爱国精神激励他人，例如苏辙出使契